

乔丽华
著

朱

朱安传

我也是鲁迅的遗物

安

乔丽华 著

朱安传

我也是鲁迅的遗物

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也是鲁迅的遗物：朱安传 / 乔丽华著. --北京：九州出版社, 2017. 5

ISBN 978-7-5108-5411-8

I. ①我… II. ①乔… III. ①朱安 (1878-1947) - 传记 IV. ①K828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132855号

我也是鲁迅的遗物：朱安传

-
-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作 者 | 乔丽华 著 |
| 出版发行 | 九州出版社 |
| 地 址 |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(100037) |
| 发行电话 | (010)68992190/3/5/6 |
| 网 址 | www.jiuzhoupress.com |
| 电子信箱 | jiuzhou@jiuzhoupress.com |
| 印 刷 | 北京金特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|
| 开 本 |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32 开 |
| 印 张 | 11 |
| 字 数 | 226 千字 |
| 版 次 |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|
| 印 次 |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|
| 书 号 | ISBN 978-7-5108-5411-8 |
| 定 价 | 48.00 元 |
-

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

乔丽华同志

你好！

昨天得你惠寄大作《我也是鲁迅的物——朱安传》，
又在阅读时得你夹在书里的来信，感激至甚。朱安
最后那一声凄惨的呼号，实在动人怜悯。常言“一双小
脚三升饭”，她却为此成了一件无人珍惜的“废物”！

这本书定能成为常销的畅销书。书此为券。

祝阅府安吉，万事称心如意！

杨绛

二〇一〇年四月十三日

||| 推荐序

寂寞的世界，寂寞的人

陈漱渝

世界是喧闹的，也是寂寞的。在喧闹的世界上，活跃着一些改天换地、运转乾坤的杰出人物，他们在人生道路上留下了深深的履痕，在历史的册页上镌刻了英武矫健的身影。在寂寞的世界里，也生存着许多渺小如蝼蚁的人们。他们自生自灭，来无痕，去无迹，随着时光流驶，像尘埃般迅速消失在大千世界。作为中国五朝古都的北平也是喧闹的，这里官盖如云，騷骑遍地；但北平宫门口西三条胡同却是喧闹世界的寂寞一角。这里位处运煤车往返的阜成门墙根，是车夫、工匠、贫民的杂居地。在西三条二十一号一所小四合院里，居住着一位妇人。她身材瘦小，脸色狭长，颧骨突出；由于缠足，行走时有些颤颤巍巍。她跟名义上的丈夫各处一室，每天基本上只有三次对话：一、叫早。回答是：“哼。”二、临睡，问关不关北房过道的中门。回答是：“关”，或“不关”。三、索要家用钱。回答是：“多少”？然后照付。为了尽可能少费口舌，名义上的丈夫将换洗的衣物放在柳条箱的盖上，塞在自己的床底下；她支配佣人洗净之后，叠放在柳条箱内，上

面盖一层白布，放在她卧室的门旁。这位妇人就是鲁迅的原配夫人朱安。

朱安是一位苦命人。我不懂佛学，但知道佛教讲“浊世恶苦”，即“生时苦痛，老亦苦痛，病极苦痛，死极苦痛”（《佛说大乘无量寿经·心得开明第三十四》）。还听说有一种苦，叫“求不得苦”。朱安在她六十九年的生涯中，真可谓诸苦遍尝。她虽然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官宦之家，但一生下即缺少天生丽质，又被缠足，无文化，这些因素自然会减损她作为女人的魅力。28岁成为老姑娘后才嫁到周家，跟鲁迅过的是形同陌路的日子。鲁迅的母亲希望她能生一个儿子，以此维系夫妻感情。朱安回答得很实在：“老太太嫌我没有儿子，大先生终年不同我讲话，怎么会生儿子呢？”跟精神生活贫乏一样，她的物质生活同样困顿。北平《世界日报》有一位记者采访朱安，看到她正在用晚餐：半个小米面窝窝头、一碗白菜汤，另外有几碟尖辣椒、腌白菜、霉豆腐。

比生苦、老苦更可怕的是的病苦。我目前已已是奔八十岁的老人，深知老人并不畏死，只求死得少痛苦，有尊严。然而这种愿望对朱安来说显得十分奢侈。我不确知朱安死于何种疾病，但从她托人代写书信来看，应该是既有肾病、肺病，多年来又有严重的胃病，再加上血液循环不畅，两腿长期处于冰冷麻木状态，真是求生不得，求死不成。“千古艰难唯一死”，这句老话在朱安身上也得到了应验。

我不懂佛学中“求不得苦”的准确概念是什么，但用世俗观念理解，大约是反映出愿望与现实的冲突吧？人的愿望如果是奢求或苛求，那“求不得”是正常的，不值得同情。如果这种愿望

属于正常的最基本的人性需求，然而又偏偏不能实现，那就会酿成人间悲剧。比如朱安希望能有正常的夫妻生活，这本无可厚非。但她从订婚到结婚却整整拖延了七年。据鲁迅故家的佣工王鹤照说，新婚后的第二天新郎就独睡书房，婚后第四天，新郎又东渡日本了。作为妻子，朱安在夫妻身处异地的日子里当然会想有鱼雁往返，但鲁迅读她来信的感受却是“颇谬”，自然也就碰撞不出跟许广平撰写《两地书》时的那种火花。朱安临终前给许广平写信，希望将她的灵柩运至上海跟鲁迅合葬。作为正常夫妻，这种愿望当然可以理解，应予满足。但对于朱安而言，这却是一种妄想，不仅许广平不会赞成，其他亲友也不会认为妥当。结果朱安既没有埋在初葬鲁迅的上海万国公墓，也没有葬在她婆婆长眠的北京板井村坟地，而是临时埋在北京西直门外的保福寺墓地。结果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“破四旧”，朱安坟墓被夷为平地，所以我们至今也不知她魂归何处。朱安临终前还希望死后每逢七日有人给她供水饭，至“五七”请和尚给她念一点经。这也是往昔一般人家的旧习俗，并不过分。但朱安无子嗣，估计也不会有什么人为她焚香念佛。

由上可知，朱安的一生是名副其实的悲剧一生。作为一种生物的存在，朱安自然有她由新生到老死的生命流程；但作为一种社会存在，她生命的意义究竟在什么地方呢？想来想去，我感到她存在的价值主要就是为周氏三兄弟贴身照料了他们的母亲。周氏三兄弟都不是一般的人物。鲁迅与周作人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地位自不待言，即使周建人也是一位生物学家、编辑家、翻译家，建国后担任过浙江省副省长，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要职。

朱安自嫁到周家，三十七年中尽心尽力承担了照料婆婆的职责，除开早晚问候起居，还要管理家务；即使家中请了佣人，下厨烹炒绍兴口味的菜肴也是她的日常劳作。鲁迅虽然恪守孝道，连给母亲购买的通俗小说都要先行阅读，但毕竟在上海定居十年，单靠书信问候起居饮食，其间仅两度北上省亲，但还要忙于其他方面的杂事。周作人在1943年5月写过一篇《先母行述》，简述了母亲一些美德，如“性弘毅，有定识”，自损以济人，读书以自遣之类，但在日常生活中恐怕距离孝行的标准尚存差距。据了解周家状况的人说，周作人自从跟乃兄闹翻之后，不但不愿见兄长，连老太太也不看。住在八道湾的时候，周作人让母亲单独起伙，母亲生病时也只好到砖塔胡同去找鲁迅带她看病。鲁迅定居上海之后，母亲不愿到八道湾跟周作人一起生活，从中似可窥其家庭关系之一斑。周建人是周氏兄弟中的老三，从小体弱多病，先于鲁迅到上海谋职，经济支绌，对于母亲恐怕是出力出钱都有实际困难。老人既需要“生活费”，更需要“生活”——这种生活就是亲人的贴身照料。朱安在她存活的岁月当中，有一多半光阴是用于照料周氏三兄弟的生母，使他们减少了后顾之忧，在不同领域作出了各自的贡献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朱安存在的社会价值恐怕是不能低估的吧。既然我们充分肯定许广平在上海期间照顾鲁迅的功劳，称她为伟人背后的“无名英雄”，那朱安伺候鲁迅母亲长达三十七年，那不也是一种功绩吗？

朱安的一生既然是一出悲剧，那么悲剧的制造者究竟是谁呢？这并不是一个复杂深奥的问题，而且前人已有公论。不过近些年来由于颠覆解构鲁迅的声音甚嚣尘上，以至于有人想依据中华民国的

法律判鲁迅以“重婚罪”，依据上世纪八十年代台湾当局修订的《民法》想判鲁迅以“通奸罪”；比较温和的责难，是认为鲁迅在家庭中对妻子施加了“冷暴力”。如果违背历史进步的逻辑来判定是非，那岂不是还要依据蒋介石政权制定的“勘乱条例”将革命前辈都判以“叛乱罪”吗？其实，鲁迅的母亲鲁瑞已经承担了自己的那一部分责任。她承认这桩不相称的婚姻给大儿子带来了终生的苦痛，所以此后二儿子和三儿子的婚事她就撒手不管了。鲁迅有一篇未完成的杂文，内容就是谈论“母爱”。鲁迅认为母爱是伟大的，但他也认为在旧时代母爱有时也是盲目而可怕的。母亲在有些问题上成见很深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只能改变十分之一、二，但没过多久又会故态复萌。不过，鲁瑞的想法和做法在当时也不是什么“奇葩”和“异端”，无非是一般人家的普遍想法和做法。由此可见，酿成朱安悲剧的总根源是旧的家族制度和伦理观念。现代的爱情观以两情相悦、自由择偶、心灵沟通为主要特征，而在中国封建社会，那种仪式化婚姻的特征却是“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”。

鲁迅去世之后，有人离间许广平跟朱安之间的关系，说什么许广平每星期都给鲁迅写信，破坏了鲁迅跟朱安的关系。又说，许广平跟朱安争夺《鲁迅全集》的版权，似乎许广平是为了金钱而跟鲁迅结合。在极端气愤的情况下，许广平写了一首白话诗《为了爱》，刊登于1937年《中流》第1卷第11期，道明了新式和旧式婚姻的本质区别：

在亚当夏娃的心目里，
恋爱结合神圣；

在将来解放的社会里，
恋爱，再——
志同道合，成就婚姻。
那言语不通，
志向不同，
本来并不同在的，
硬说：“佳偶”，
就是想污蔑你的一生。

所以，要根除无爱情婚姻酿成的悲剧，从根本而言就是要涤荡旧式的伦理观念和婚姻制度，而不能苛责旧式婚姻的受害者，使他们受到双重伤害。鲁迅在文章中叫出了“没有爱的悲哀”，叫出了“无所可爱的悲哀”（《随感录·四十》），号召人们把妨碍人类享受正当幸福的一切旧制度、旧观念、旧习俗通通踏翻在地，哪怕是历来被视为凜然不可冒犯的《三坟》《五典》，百宋千元，天球河图，金人玉佛。许广平也表示，她跟鲁迅之间有着共同反抗旧伦理的思想基础，决心“一心一意向着爱的方向奔驰”“不知道什么是利害、是非、善恶”。在鲁迅和许广平这两位“同行者”面前，朱安确如她自比的那只蜗牛，虽然想尽力慢慢往上爬，终究无法接近鲁迅心灵的殿堂。

前文提到，朱安是一个旧时代普通的悲剧人物，只是因为她嫁到了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鲁迅家，才受到了世人的特别关注。把朱安这个寂寞的人引入到“公众视线”有什么意义呢？根据现代传记理论，传记写作的对象并不限于凯撒、拿破仑、成吉

思汗、腓特烈大帝一类人物。除开帝王将相、英雄豪杰、才子佳人，普通人的人生故事也可以反映出时代的一鳞一爪。只有依据各色人等不同的生命史和心灵史，才能整合出一部最为真实、最为鲜活的人类历史。所以，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倡导者胡适不但鼓励陈独秀、蔡元培、梁启超撰写自传，而且1919年11月30日还亲自为一位英年早逝的普通知识女性李超立传。为朱安立传，当然不能从中品尝什么心灵鸡汤，获取什么励志教诲，但正是朱安这位个性色彩鲜明而不引人注目的人物，可以反映出“无爱情结婚的恶结果”（鲁迅：《随感录·四十》），是研究中国妇女史、伦理史的一个活标本，对于研究鲁迅生平更具有直接的意义。

在当下，美女几乎成为了不同年龄段女性的统称，但用“美女”二字称呼《朱安传》的作者乔丽华博士显然不够庄重。但是，将乔博士迳称为“才女”，却应该说是名至实归。我跟乔丽华在研究鲁迅手稿和整理许寿裳文稿的工作中多年合作，深知她知识面广，文笔优美，兼修中外文学和现当代文学。她的才华不仅来自于刻苦钻研，而且必须承认还有其先天的禀赋。禀赋相对差的人固然也能够做学问，但禀赋加上刻苦，那就如虎添翼。乔丽华说，她撰写《朱安传》最大的困难就是史料匮乏，“巧妇难为无米炊”，但经过实地考察，走访调研，把口述史料、文字史料和实物史料进行综合提炼，读者就会发现乔丽华烹制的不是一盆清汤寡水，而是一席美味佳肴。她说写作过程中她想站在女性的立场，对女性命运加以关注和思考。但这位女性作者在这部史传中秉持的仍然是存真求实的公正立场，并没有表现出某些西方女性主义者的偏执。乔丽华是懂理论的，但她在这部传记中表现

出来的考证功力也相当了得。最让我佩服的是她对鲁迅 1914 年 11 月 26 日的日记中“得妇来书”这件事的考证。因为当年 11 月 22 日朱安从绍兴寄给北京鲁迅的这封信荡然无存，所以鲁迅为什么会斥责信的内容“颇谬”就成为了千古之谜。有老专家说，这是因为朱安在信中劝鲁迅纳妾。但这种说法仅仅是出自推测，朱安即使有这种念头，也未必就是写在这封信里面。乔丽华则根据周作人同年 10 月 30 日和 11 月 18 日日记中关于朱安的两则记载，得知当时朱安房中窜进了一条白花蛇，而民间常把蛇视为淫物，所以，朱安特请周作人买了一枚“秘戏泉”（即铸有春宫图的钱币），想以春宫辟邪，并写信向鲁迅表白自己内心的贞洁。乔丽华自谦地说她的这种解释也是一种“推测”，但因为有周作人日记及绍兴民间习俗为依据，所以这种“推测”就比此前一些专家的推测更贴近于事实。仅此一例，也就能说明乔丽华涉猎之广博，考证之缜密。

众所周知，自改革开放的四十多年，鲁迅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，形成了一门体系完备并产生了国际影响的学科。但目前也遇到了瓶颈；特别是在网络世界，有时甚至出现了邪不压正的畸形现象。所以，这部《我也是鲁迅的遗物：朱安传》的再版，在鲁迅研究界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情。它标志着鲁迅研究后继有人，也证明了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定然会有悠长的生命力，不会像那种学术泡沫，也许会借某种光源炫耀于一时，但顷刻间就会破灭，化为乌有。

是为序。

||| 再版前言

原本以为朱安只是一个边缘人物，鲜有人关注，不料这本传记出版后却出乎意料地得到大量反响。我欣喜地看到，这些年“朱安”已然成为一个较为热门的话题，引发了人们多方面的讨论和思考。去年，值鲁迅先生逝世 80 周年之际，今日头条文化频道发布 2016 鲁迅文学大数据，其中“鲁迅相关度最高的家族成员”中，“朱安”榜上有名。

本书出版后将近 8 年间，我陆陆续续收到一些来信和读者的反馈，许多读者站在女性的立场上，对朱安这样一位旧女性寄予深深同情，为之唏嘘、感慨。尤其让我意想不到的是，杨绛先生也注意到了这本书，她在报上看到《朱安传》的介绍后，给朱正先生的信中提到我的这本书，说：“我觉得这是血泪的呼声。”朱正先生把这封信复印给我，并在信中不无幽默地问我：“你愿意送一本大著给这位热心的读者吗？”我立即按照朱正先生提供的地址寄出拙著，并附了一封信，表达一个后辈的仰慕之情。书寄出后我从没有想过杨绛先生会给我回信。在我想来，钱钟书的夫人、翻译家、作家杨绛先生，且已届高龄，对于不知名作者寄来的书，翻两页大致了解一下，大概已经很够意思了吧？惟其如此，当有一天收到一封字迹陌生的来信，随意地拆开，却看到落款是“杨绛”两个字，别提有多惊喜了。杨绛先生在回信写道：

“朱安最后那一声凄惨的呼号，实在动人怜悯。常言‘一双小脚三升泪’，她却为此成了一件无人珍惜的‘弃物’！”杨绛先生关注女性的命运，她对朱安流露出深深的同情。

本书出版后，得到诸多鲁研界前辈的肯定，有些学者则指出朱安对鲁迅的影响至为深刻：“一个伟人的诞生，往往出于迫不得已。鲁迅文风的阴冷、偏激、滞涩，也与朱安这个背景有关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朱安成就了鲁迅。”（陈丹青语）也有研究者围绕鲁迅与朱安婚姻中的一些问题，提出种种疑问……总之，在鲁迅研究的领域，就像周氏兄弟为何反目始终是个未解之谜，鲁迅与朱安的关系也是个道不尽的话题。

当然，2009年底《朱安传》出版后，也有细心的读者向我指出了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，包括当初由于时间仓促，个别地方没有仔细核对所产生的差错。这次再版，正好能把这一类的讹误加以订正，而更主要的是能对本书做些必要的修订和增补。

此书出版后，叶淑穗老师对于我用“弃妇”一词描述朱安婚后的状态提出了不同意见。她在信中说：“我认为鲁迅对朱安，虽然是不喜欢，只作为母亲送他的礼物，供养而已。但从鲁迅对他的态度来说，始终还是尊重的……当然在鲁迅的心里确实也是无奈。但鲁迅没有抛弃，所以我看到您有一个标题用‘弃妇’我感到心里有些接受不了。鲁迅对这桩婚事虽在感情上接受不了，但他始终都是承认的，在日记中也将她写成‘妇’。这个意见仅供您参考。”

叶老师的这个意见一直萦回在我的心中。可以说，当初用“弃妇”这个标题完全出于我的直觉，感性的成分居多。虽然我

认为这个词并不过分，但也必须承认它可能会对读者产生误导。记得有一年我赴外地参加一个鲁迅研讨会，席间遇到一位老师，她直言不讳地认为《朱安传》过分同情朱安，贬损了鲁迅。尽管我并不能接受这位老师的观点，但也使我反思：我的有些用词是否表现出过多感情色彩，从而容易使人产生误解？因此，这次我把标题《弃妇——落地的蜗牛》改为《深渊——落地的蜗牛》。“深渊”一词，同样表达了朱安跌落谷底后的悲苦处境，也更符合本书的宗旨——用资料说话，不做过多的阐述。

叶淑穗老师还向我指出了一处差错，关于初版本第124页的一幅合影的说明。她在给我的信中指出：“P124，左起第二人认为是许美苏，实际上左起第四人才是许美苏。此事俞景廉和我也做过讨论。他曾对此发表了文章，可查《鲁迅研究资料》。”查《鲁迅研究月刊》，确实刊登过多篇俞景廉先生关于他母亲许美苏的文章，还有叶老师的《许美苏与鲁迅文物——记许美苏在鲁迅博物馆的日子里》等文，某种意义上也侧面提供了朱安在西三条的生活背景资料。对于叶老师的指正，我非常感谢！

还有已故的高信先生，作为鲁研界的前辈，看了这本传记后，热心提供给我周作人的外甥杨吉昌（周静子之子）写的《忆外祖父周作人》一文，文章对八道湾11号的情况有较为详细的描述，其中有“大外祖母”一节，很短，内容如下：

大外爷鲁迅的原配夫人朱安是和鲁迅的母亲住在一起的，她们在西三条住了多久呢？或许她偶尔也来过八道湾，我幼时见到大外祖母，留下的印象并不深。记得她的头发向后梳结成一个

髻，椭圆形的脸，下巴较尖，矮个子，底下一双旧社会常见的小脚，谈话声音很细，自然是绍兴口音，我见到的她也在六十岁左右了吧！而我却没有见过大外爷，他去世在我出生之前。

大外祖母指的就是朱安。杨吉昌此文发表于1995年，发表在《华山天地》上。这篇文章前面有高信先生的《写在前边》一文，对杨吉昌及其家人的情况做了一些介绍。从高信先生和杨吉昌的文章可知：周作人的长女周静子于1935年与留日回国的数学教师杨永芳结婚，次子杨吉昌生于1938年，所以他从未见过鲁迅，却见过大外祖母朱安。1949年后杨永芳任西北大学数学系教授，周静子随杨永芳去了西安，主要料理家务，他们的一双儿女（杨美英和杨吉昌）都曾在秦岭电厂子弟校教书。周静子大约去世于1984年。此外杨吉昌还提到阿姨周鞠子（周建人之女）去世于1976年唐山大地震。

尽管杨吉昌的回忆主要讲述周作人一家的情况，但跟朱安不无联系。据高信先生说，杨吉昌曾给高先生看周静子的两张结婚合影，照片上都有朱安。高信先生还将这两张照片复印给了我。事实上，尽管鲁迅与周作人反目，但后来朱安与八道湾11号并未完全断绝往来。有研究者注意到新披露的周作人1939年1月9日的一则日记，里面写到：“下午大嫂来。”由此指出：这里的“大嫂”，显然不是许广平，而是朱安女士。周作人1月1日在八道湾寓所遇刺，“为暴客所袭，左腹中枪而未入，盖为毛衣扣所阻也。启无左胸重伤。旧车夫张三中数枪即死，小方左肩贯通伤。”得知周作人遇刺之后，朱安女士还是抽时间前往探视。

我在书中引用了周作人早年绍兴时日记里关于“大嫂”的记载。其实到北京后也是有记载的，如1932年就有几处提到“大嫂”：

8月16日 阴 ……旧中元，午祭先祖，母亲大嫂来，下午去。

9月8日 晴 上午大嫂来，托代交佩弦贺礼。

9月19日 阴雨 ……大嫂来即去。

9月21日 阴雨，下午晴 ……下午往商务买书……大嫂来……

从以上几则日记可以看出，像中元节这样的日子，鲁迅母亲和朱安会去八道湾跟周作人一起祭拜先祖。而送朱自清（佩弦）贺礼，朱安也托周作人转交。另外9月周建人之子丰三住院，这段时间鲁瑞和朱安婆媳俩多次前往八道湾。自然，日记中也多次记载周作人和羽太信子前往西三条看望母亲。这些虽是微末小事，但知者不多，故趁此机会在这里写一笔。可惜的是周作人日记还没有全部影印出版，仅能看到1934年以前的部分，如全部影印出来，对于周氏兄弟及周氏家族的研究是很有价值的。

这些年网上关于朱安的文章屡屡见到，其中陆波的《在保福寺桥下，寻找历史的草蛇灰线》一文挖掘了关于朱安最后的埋葬地保福寺的一些情况。根据陆文，从明朝起，在中关村这块永定河故道的低洼地区，就开始兴建寺庙，特别是明清两朝太监偏爱在这一带购买“义地”（墓地），后来普通人也愿意埋葬在这片抬眼即看到西山的土地上，形成了中关村一带寺庙、坟地众多的格局。保福寺建于明正德十一年（1516年），到清朝道光年、光绪